

利用图书馆来进行科学的研究工作

——陈垣老人訪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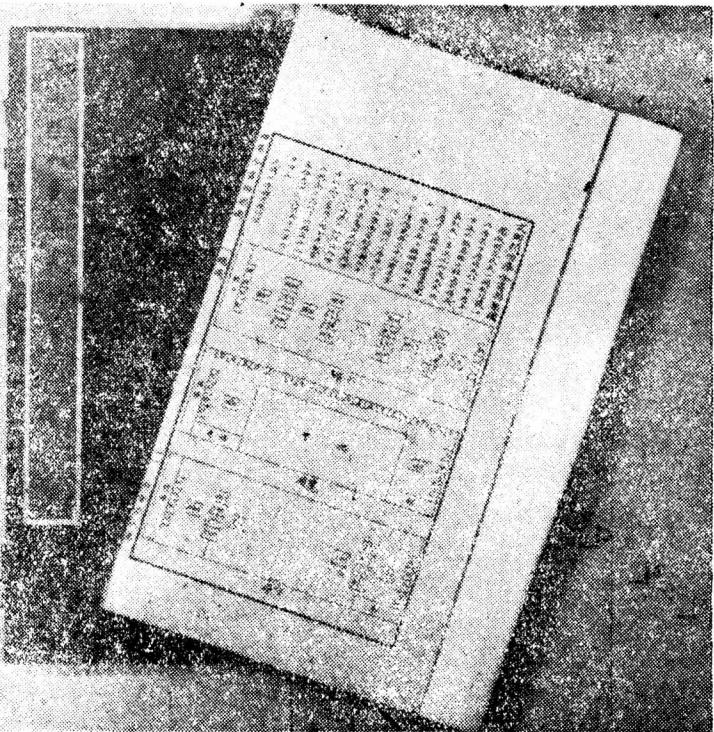
健 行

几天前，我怀着兴奋和崇敬的心情去訪問了著名史学家陈垣老人。陈垣老人在北京图书馆尚称为“京师图书馆”时，曾兼任该馆馆长；后来又連續作館委会委员和购书委员会委员等数年。解放以后，他还不断亲自来馆看书。他很关心图书馆事业，殷殷垂詢北京图书馆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他亲切地表示：他和北京图书馆是有很深厚的关系。我于是向他概括地汇报了北京图书馆的近况。他注意倾听，兴奋地說道：图书馆事业突飞猛进地在发展，首先是由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大力支持。这些成就是在旧社会是难以梦想的。陈垣老人从他和北京图书馆的关系进一步談到了四十多年前他在北京图书馆研究文津閣本“四庫全书”的經過。

和图书馆員交朋友

陈垣老人今年已有八十二岁，身体康健，精神愉快，每天手不釋卷。他曾經走过一段漫长崎嶇的治学道路，他认为在北京图书馆究研“四庫全书”的年代，是他不能忘怀的一段治学经历。他早年在广州曾閱讀“四庫全书总目提要”好几遍。其中所著录的图书許多都在广州找不到。辛亥革命后，他来到了北京。时热河文津閣“四庫全书”已移来北京，貯藏在“京师图书馆”內。他于是天天去“京师图书馆”閱讀“四庫全书”。“四庫全书”是包括三千四百多种著作，共計三万六千多冊的一部大丛书。他勤勤恳恳、坚持不懈地对“四庫全书”前后陸續研究了十几年。他对这部大书

下了苦功。他在讀“四庫全书”以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如編“四庫撰人录”、“四庫书名录”和“四庫全书考異”等。他仔細地校讀了“四庫全书簡明目录”。“簡明目录”有一种赵怀玉本，是“四庫全书”尙未完成时印行的，后来因文字獄的株連和其他原故，有些著作被撤換，陈垣老人用原书和这本目录校对，了解到这部目录和“四庫全书”不完全符合的实际情况。当时“京师图书馆”接管这部大书以后，未及自行編目，就是使用这部目录的通行本借书取书。管理人員还不知道这部目录和原书有不同。他們对陈垣老人所要借的书，常常弄不清书的有无。但陈垣老人却知道哪些是有目无书，哪些



“文淵閣四庫全書排架圖”中的平面圖

是有书无目。不仅如此，他还知道某一种书放在某一书架的某一层上。有一次，他写了一张有书无目的借书条交给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找了一阵没有找到，他对陈垣老人说：你自己进库去找罢！陈垣老人进入书库以后，随手就把借书条上写的那部书从书架上取了出来。管理人员对陈垣老人熟悉“四库全书”排架了若指掌，大为惊奇佩服。当时“京师图书馆”管理善本的人叫李耀南，原先对陈垣老人的借书很有意见，后来他们终于结成了好朋友。说到这里，陈垣老人爽朗地大笑道：“我和李耀南由争吵变成了好朋友！”他接着解释他为了便于研究这部大书，曾对全书的排架进行了缜密的研究。他在基本摸清了全书的排架情况以后，于是摹制了一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排架图”。图上精当地画出书架的位置和次第，写明每一层书架上图书的书名。下了这一番苦功后，哪部书放在哪个书架上，他心中就有数了。他边讲边将这部排架图翻开给我看。第一面绘有“四库全书”全部排架的平面图，平面图以下全是填满了书名的表格。这是一部精心绘制、工整精确的图样。我看完这部排架图后，更加佩服老人严谨缜密的治学态度和刻苦钻研的治学精神。老人的这种治学态度和精神，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依靠集体力量，重视调查研究

陈垣老人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中，认识到中国的古籍浩若烟海，整理古籍光凭一二人之力是无法胜任的，必须依靠集体力量。当他在“京师图书馆”研究“四库全书”时，协助他进行工作的，除去“京师图书馆”的馆员外，他还邀请了助手王冷斋（七七事变宛平县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去年病故）等七八人。当时他对这些人力作了很好的安排和组织。陈垣老人说：他们总是在前一天晚上，先根据“简明目录”抄一个初稿，以备第二天工作时使用。工作时分两人为一组，除去校对目录上每一部书的书名、作者和卷数以外，连每一部书的函数、册数和页数都详细检查。发现错误，就在目录上圈出。每一部书先由两人各分一半检查清点，检查清点一遍以后，两人互换再检查清点一次，以求精确。每书的函数、册数和页数都分别记在书名下预制的空格内，最后再由一人负责合计每一部书的总页数。陈垣老人每天都从清晨就和大家一起去图书馆工作，晚上回来又亲自作一次总检查，并准备次日工

作，然后又将书名、作者、卷数等不同的地方，仔细考订，一直工作到深夜。这样紧张地工作了三个月，全部工作顺利完成。工作完成的那一天，陈垣老人曾邀集参与其事的人摄影留念。根据像片上陈垣老人亲笔题记的年月——民国九年八月——到现在刚好是四十一周年了。陈垣老人记忆力很强，虽然事隔四十余年，他对像片上的人还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当时有人对这种工作，厌其烦琐，陈垣老人就给他讲解研究工作不能怕麻烦的道理。经过这次细致的工作以后，才算彻底摸清了“四库全书”这部大书的大致情况，正如陈垣老人所说，“这是基础工作，只有检查一次才能心中有数”。这时陈垣老人就请他的研究助手刘迺和同志去取当时纪录页数的稿本来给我看。陈垣老人书屋内排满了书架，架上桌上都放满了书。但他清楚知道哪一部稿本放在哪里。他告诉刘迺和同志这部稿本存放在第九书架上，刘迺和同志照着他的吩咐，很快地就把这部稿本抱了出来。陈垣老人对图书资料有条不紊的管理办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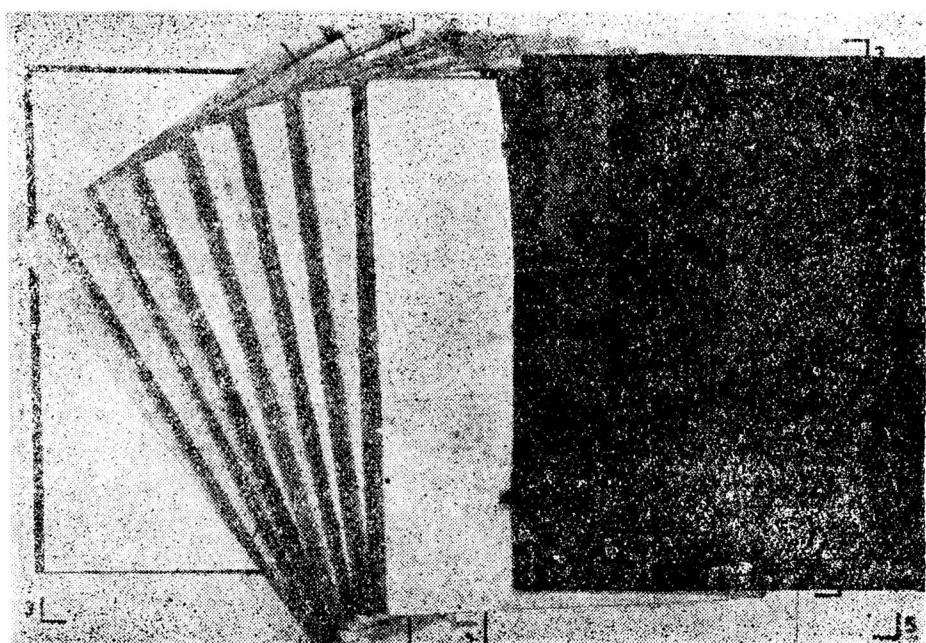
这时，陈垣老人指着排架图上的平面图说：文渊阁的结构是模仿天一阁的，共计六楹。六楹就是六间，六间房屋如何开门呢？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经过实际调查研究，才知道楼梯亦算做一楹。因此名为六楹，实际就是五楹，也就是五开间。他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就是有些书本知识要通过实践才能搞清楚；实际调查是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一环。

大好时机，努力为之

陈垣老人在旧社会过了大半辈子。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比了新旧社会做研究工作的难易。他在旧社会找图书资料有以下几个来源：自己的藏书，朋友的藏书，图书馆的藏书和书店的图书。前三个来源都解决不了研究上的需要时，才向书店去买。但买书是很花钱的。当他撰写“元西域人华化考”这篇著名论文时，曾花费了七百多元购买必要的图书资料。他叹息说：“我们这些经济条件很差的穷秀才负担起来，的确是很困难的”。他又感慨地说：“解放前做研究工作真是难关重重，图书资料就是一道难关。”老人接着以愉快的心情谈到了解放以后的研究和出版工作。解放以后，很多不易见、不易得的古书都被发掘出来，公诸社会，过去只有少数人能

看到的，今天已成为人民的財宝，而且很多已影印出版了。有些大部头书，在旧社会无力印行的，但在今天只要有参考价值的，都已逐渐再版。如“冊府元龟”是一部五百多年来沒有重刻过的大部头书，今天也影印出版了。解放后出版的新书，北京图书馆都入藏一部甚至几部。图书馆入藏极其丰富的图书資料，为研究工作准备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陈垣老人对北京图书馆便利研究人员借阅图书資料和积极帮助研究人员寻找图书資料等工作，感到高兴。他认为，在图书馆内，图书的保管与利用应有很好的结合，过分强调保管，会使很多有用的图书資料不能为专家学者所利用。他很注意目录索引工作。刘迺和同志对我說：陈垣老人在研究一个专题以前，一定要编一些有关的目录索引。老人在研究元史以前，根据“四庫全书”中六十种元人文集編了一部“文津閣本元六十家文集目录”。我向老人汇报图书馆主动編制专题目录供

研究人员使用的情况。陈垣老人情不自禁地贊叹道：“以往研究人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亲自編目录索引，現在有图书馆代劳，对研究工作來說真是功德无量！”他希望北京图书馆在为科学的研究服务方面能够提供更多的图书資料，貢献出更大的力量。他认为，图书馆做好为科学的研究服务的工作，就是间接为工农兵服务。为科学的研究服务与为工农兵服务是一致的。最后，陈垣老人带着互相勉励的口吻表示：今天党和政府給图书馆事业和科学的研究人员創造了一切有利的条件，真是大好时机，努力为之，努力为之！



文津閣本元六十家文集目录

北京图书馆和科技史研究 ——和李儼先生一席谈

文 津

李儼先生是研究中算史的著名专家。近年来，他主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努力从事于科技史的研究。他很关心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情况。他經常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充分利用該館的图书資料。解放前，他曾為該館所出版的学术刊物——“图书馆学季刊”写过多篇学术論文。目